

收稿日期:2024-09-19

黄侃语言哲学的理论贡献与历史定位

宋 喻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黄侃在语言哲学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语源论、语言研究方法、训诂的解释学定位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文字的起源,他作出了“邃古之初,已有文字”的新论断,对文字的神秘起源说提出了质疑;第二,关于语言文字的研究方法,基于对声训的合理性的肯认,他揭橥了“推之之法,则在审音”的“求本字”新路径,提出了“因象形、指事之字以推寻语言音声之基”的“寻语根”新方法,其实质是以语根为统帅,以语言的声音贯穿文字的研究;第三,他“以语言解释语言”界定了“训诂”,从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高度,从解释学角度说明了训诂的对象、内容和本质,根本目的在于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质言之,黄侃提出的“求本字”和“寻语根”的文字研究方法以及“以语言解释语言”的新训诂学,是其在中国现代语言哲学史中所作的重要贡献,对中国现代语言文字之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黄侃;语言哲学;本字;语根;以语言解释语言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4-0087-08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语言哲学视域下的中国近代知识论问题研究”(24NDJC08Z)。

作者简介:宋喻(1984—),女,浙江建德人,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语言哲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4.049

黄侃(1886—1935),字季刚,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师从章太炎研习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校任教授,在经学、文学、哲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成就卓越,后人将其与章太炎、刘师培同称为“国学大师”,将章太炎和黄侃开创的学派称为“章黄学派”,评价其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小学是黄侃学术的根基,其主要撰述有《说文略说》《黄侃论学杂著》《说文笺识四种》《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尔雅音训》等。黄侃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说文学中,但学界大多重视黄侃的说文学成就^[1-3],较少有人总结其在语言哲学上的总体贡献,故不揣浅陋,尝试作一粗浅分析。

一、“邃古之初,已有文字”的文字起源说

语源论主要探讨语言形成途径,揭示主体与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感官与内容的感知与被感知的关系、社会与语言的规约与被规约的关系。“语源论是关于语言来源的理论,包括语言意义的来源、语言符号的来源。”^[4]语源论是语言哲学必须最先回答的问题。许国璋说:“对于语言的起源问题,中国古时哲人也是从书写形式着手的(事实上这也是最为可行的方法)。”^[5]汉语的书写形式就是汉字。

黄侃之前,论文字的起源通常采用许慎《说文·序》所载仓颉造字说。对此,黄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的《说文略说》中有“论文字初起之时代”和“论文字制造之先后”两节专门论述这一问题,他说:

文字之生,必以寝渐,约定俗成,众所公认,然后行之于无闕。窃意邃古之初,已有文字,时代绵邈,屡经变更;壤地伽离,复难齐一。至黄帝代炎,始一方夏;史官制定文字,亦始周之有史籀,秦之有李斯。然则仓颉作书云者,宜同繇作城郭之例;非必前之所无,忽然创造。^[6]

黄侃认为,人类在诞生之初即有语言,而文字是在人类思想交往逐渐频繁以后才产生的。不仅如此,黄侃还推断语言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逐渐发展的、约定俗成的过程。人类语言文字都是如此,汉字自然也不例外。仓颉、史籀、李斯等人只是文字的收集者和整理者,并非仓颉之前没有文字。黄侃纵观语言文字发生的历史过程,断定“邃古之初,已有文字”,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论断,这个论断质疑了文字的神秘起源说(如仓颉造字之类)的正确性,已被现代考古学的研究证明是科学合理的。

人类语言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语言的发展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的发生和发展同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一般说来,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这已是公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要说清哪一部分文字产生在哪一部分之前,是“事不可指”,然后才“借形以表之”,还是先有有形之象形,后有无形之指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既涉及语言的起源问题,也涉及文字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到目前也还在争论不休。一般的逻辑推理不能解决问题,一些个别字例的说明,也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正如姚小平所说的那样,语言的起源实际上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因果链”,而人们却试图让它停住,把某个环节当作链条的起点^[7]。对于象形和指事孰先孰后的问题,黄侃赞同许慎之说,认为指事应该在象形之前,他说:“指事之字,当在最先。生民之初,官形感触,以发词言,感叹居前,由之以形容物态之语;既得其实,乃图言语之便,为之立名。是故象形之字,必不得先于指事。”^[8]黄侃在这里根据语言起源的感叹说来间接论证这个问题。虽然感叹说有一定的理论缺陷,曾遭致一些批评,如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丕尔的驳斥:“语言成分中,感叹词属于最不重要的部分。……没有任何可以抓得住的证据——历史的和其他的——足以说明语言成分和语言程序大体上是从感叹词演化来的。感叹词只是语言词汇中极小的和功能上最不重要的一部分。”^[9]又如林远泽也对感叹说略有微词:“感叹说显然只触及到作为语音之基础的声音姿态,它仍是情绪表达的身体运动,而非能表达客观意义的词语。且词语的意义也不是单纯透过模仿对象或他人说话的声音就能学会,而是必须奠基在指示手势与表现手势的身体建构之上。”^[10]但黄侃能够借助西方语言学的先进研究成果来解释中国语言哲学中的一些经典问题,反映了黄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学术抱负和“度越前人、不断创新”的理论勇气。

二、“求本字”与“寻语根”的语言研究方法

黄侃视域中的小学分形、音、义三部,虽然如此,但形、音、义三者同依一体,“视而可察者,形

也;闻而可知者,声也;思而可得者,义也”^{[11]257},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有其一必有其二,譬如束芦,相依而往矣”^{[11]257}。黄侃将“形、音、义三者不可分离”的关系视为小学之定理,认为遵循此定理可成大学术,违此定理则生无穷之谬。既然小学分为文字、声韵、训诂三科,是语言文字之学,但从小学研究发生的历史顺序看,《尔雅》出现最早,《说文》次之,《广韵》则在中古以后。如此看来,先有训诂,而后才有文字、声韵之学。为什么黄侃研究小学又不得不由文字入手?在黄侃看来,“小学本以语言文字为全体,然语言之范围太广,不得不由文字入手为之始基”^{[12]141}。因此黄侃的小学论著便是从文字入手的。

黄侃所说“语言之范围太广”有双重含义:(1)从时间维度审视,语言的演进轨迹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以汉语为例,其演变历程可细分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而古代汉语又能进一步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等不同阶段,自上古至当下,形成一条绵延漫长的历史发展脉络。(2)从空间维度考察,语言的地域差异极为显著,各地方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歧异状态。语言作为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广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存在于古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之中。面对如此广泛宏阔的语言现象,如何确立合适的研究切入点,成为语言科学研究的首要方法论命题。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化载体与信息存储介质,具有突破时空界限的传播功能,能够通过符号固化实现语言的历史传承与跨地域流通。而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同样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因此,抓住文字这一关键,以文字研究为基础,声韵、训诂的研究才得以展开,这就是黄侃语言研究的内在逻辑。在黄侃看来,文字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关键,而文字研究的关键则在于“求本字”。

(一)求本字:“推之之法,则在审音”

求本字既是文字学上的问题,也是训诂学上的问题。黄侃曾在多处谈到这个问题,而集中论述,则在《求本字捷术》《略论推寻本字之法》诸篇。

什么是本字?黄侃在《略论推寻本字之法》中说:

六书之中,惟象形、指事字形、声、义三者多相应,其他则否。盖象形、指事之初作,以未有文字时之言语为之根,故其声、义必皆相应,而即所谓本字也。然最初造字之时,或因本字不足,即用本字以为假字,故造字时已有假借也。文字随言语、音声而变易;因声音之变易而假借遂亦有变易。为时既远,声变日繁,其所假借之字竟与本字日远而不易推矣。至文字应用于文章,亦多用假借。有因正字不足而用假借;有因遵守习惯而用假借;有因避同去忌而用假借。盖假借之用愈广,而本字愈为难求;本字愈为难求而本字与假借不相应之处愈多,其相去亦愈远。惟研究文字学者,固不能以其难而置之也。^{[13]53-54}

本字是与假借字相对而言的,凡假借字必与本字相应而存在。黄侃是从造字和用字两角度来求本字的。也就是说,有造字阶段的假借本字,有用字阶段的假借本字。造字阶段的假借本字,是表示原始语根的象形、指事字,它是文字学中六书造字法研究的范畴;用字阶段的假借本字,是表示语句中假借本义的被借字,则是训诂学中通假研究的范畴。小学中文字、声韵、训诂是个有机的系统,三者不能分,因此,研究本字,乃是文字学中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求本字”?这与中国文字产生的特性和中国文字在使用过程中的特殊习惯有关。黄侃在谈到训诂时说:“凡人皆有求真匡谬之心,故于文字之有误者,必考其致误之由;有变者,必考其未变之本。……盖文章可随俗而相通,训诂必求真而返本也。”^{[13]196-197}什么是“求本字”?黄侃说:“凡求文字之义训,与其初造字时之形体、声音相符,即求本字之谓也。”^{[13]196}汉人注经,多求本字。而把求本字作为一种理论而自觉地运用于训诂实践,殆始于清人,黄侃曰:“清世戴震创求本字之说,段玉

裁注《说文》,遂壹意推求本字。惟本字、本义实不易断……缘初期象形、指事字,音、义不定于一,一字而含多音,一形而包数义,如一一推寻,亦难指适。且古时一字往往统摄众义,如拘泥于一形一义,而不知所以通之,则或以通义为借义。”^{[13]183}那么,如何推求本字呢?黄侃以《说文解字》为确定本字的标准,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为我们指明了途径:

推之之法,则在审音。盖假借之关乎音,犹鱼之于水也;鱼离乎水则困,假借离乎音则绝。故已知一字之音古属何类,进而求之,则可触类贯通者矣……若,《说文》云:“择菜也。”此其本义。而伪《孔传》云:“顺也”与择菜之义不相通,此乃假若为如也。如,《说文》云:“从随也。”从随即顺,可知如为若之本字也……既为假字,必有其根;推其字根,即推其本字也。学者明乎推寻本字之法,于文字之学,若探骊而得珠矣。^{[13]54}

黄侃以声音来推求《说文》之本字,为求字之本义和正确解释词义提供了科学依据。他明确表示“学者明乎推寻本字之法,于文字之学,若探骊而得珠矣”,可见求本字之法之于文字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所在。黄侃这种以声训中的声音重复为求本字的形式是中国人的一种语言表达和意义生成方式,这种生成方式“具有腐蚀所指,令能指自指的功能,其意义的生成,不同于能指与所指间确定性联系的建立,而通过打破单一的、静态化的抽象关系,在能指自指的形式指引中,从基础存在的形上之维看意义的生成,体现着中国人观照世界万象的别样方法、精神旨趣与存在方式”^{[14]253}。

不过,黄侃的文字研究,除了通过审音的方法来推求本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即是寻语根的方法。

(二)寻语根:“因象形、指事之字以推寻语言音声之基”

黄侃区分了本字与语根:

凡会意、形声之字,定以象形、指事为之根。象形、指事之字,定以无字时之语言为之根。故因会意、形声以求象形、指事之字,是求其本字也;因象形、指事之字以推寻语言音声之基,是求其语根也。然以假借求本字者,既以音声之多变而不易得,则以本字求语根者,亦必以音声之多变而不易得也。^{[13]57}

为什么要“因象形、指事字以推寻语言音声之根”呢?这是因为“盖文字之基在于语言,文字之始则为象形、指事。故同意之字往往同音;今聚同意之字而求其象形、指事字以定其语根,则中国之文字皆有所归宿矣。”黄侃举才、裁、载、栽等字为例,他说:“这些字皆属齿音,同有初义。裁、载、栽皆形声字,不能为语根。凡此诸字皆自才来,才为指事,即诸字之语根也。”^{[13]198}寻语根的本质主要是以声韵求文字之系统。黄侃说:“讲小学不宜专究形体,必以声音、训诂为先务。知形体与声音相附丽之理,是为最要。”^{[13]19}因此,黄侃治《说文》时并不只是对小篆形体逐字地作个案分析,而是强调以声韵求文字之系统。他说:“欲求文字之系统,必先基诸音韵;欲求六书之本始,必先问乎独体。然则独体与音韵之于六书,犹衣裳之有要领也。此以音韵求文与文,文与字之关系也。文与字之关系既得,则条理系统不言自明。”^{[13]45}接着黄侃总结说:“总而言之,当知三事:1. 文与文有关联,文与字亦有关联;2. 凡字必有所属,孤立之字,古今所无;3. 以多音之法推之,则牵系益多。故中国文字俱脉络贯通,而音韵者,文字之咽喉也。”^{[13]46-47}在此,黄侃明确提出了“音韵者,文字之咽喉”的重要论断,为中国现代语言文字之学指明了方向。如何理解“音韵者,文字之咽喉”?具体来说:“大抵见一字,而不了本义,须先就《切韵》同音之字求之。不得,则就古韵同音求之……如更不能得,更就异韵同声之字求之。更不能得,更就同韵、同类或异韵、同类之字求之。终不能得,乃计校此字母所衍之字,衍为几声,如有转入他类之音,可就同韵异类之字求

之。”^[15]黄侃的上述理论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肯定,如:李志春反对“‘因声求义’在同音字选择上是随心所欲”的观点,批评这种思维方式过于对象化,提醒“若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其意义生成,将会发现这种选择行为不是肆意随机的,而是有生存的理解,作为声训训释之有效性的前提,合理且必要”^{[14]287},并进而以生物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为例,分析声音重复形式的意义生成机制,进而揭示与之相应的中国古代思想中音义间的独特关系,论证了声训的合理性,进一步印证了黄侃“音韵者,文字之咽喉”论断的正确性。

求本字和寻语根的文字学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黄侃也论证得非常清楚,他说:

凡假借必有本字,本字必有语根。能悉明其本字,则文字之学通;能悉明其语根,则声音之学也通也。学者于此当三复之可也。^{[13]58-59}

从以上论述可知,黄侃的文字学研究是从三个层面逐渐深化的:(1)从假借字寻找本字;(2)从会意、形声字中找出其中象形、指事字根;(3)从象形、指事字中推寻语言声音之基,找出语根。这三个层次的工作,紧密相连,互相制约,而最终目的则是推寻语根,以声音贯穿全部文字的研究。而其结果,则是建立《说文》的字族体系,这是黄侃所要建立的新的文字学体系的内在要求,因为这个字族体系,是以语根为统帅,即以语言的声音贯穿文字的研究,所以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字源学的文字学体系,是一种为建立中国语言学史而服务的文字学体系。

三、“以语言解释语言”的训诂精神

黄侃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又说:“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的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13]181}黄侃这一段著名的有关训诂和训诂学的定义,被许多训诂学的著作引用。笔者在此主要强调两层含义:

其一,“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这是对训诂所下的定义,也是针对历史上大量训诂实践所作的总结。中国的训诂,萌芽于先秦,渗透在各类古籍之中,训诂的实践由来已久,十分丰富。但是,把古代文献中用语言解释语言的这种活动名之为训诂,则是秦汉以后的事。《说文·言部》:“训,说教也。”“诂,训故言也。”汉代许慎的意思是,“训”是解说文意,借以教化他人,“诂”是训释古代语言。魏代张揖《杂字》云:“诂者,古今之异言;训者,谓字有意义也。”意思是,“诂”是就古今语言的不同作出解释,“训”指说解字义。晋代郭璞注《尔雅·释诂》,他在解释篇名《释诂》时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把“通方俗之殊语”作为“诂”的内容,比许说、张说更丰富了。唐代孔颖达云:“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16]以上都是就“训”和“诂”分别作出的解释,说明的都是解释字义的活动,由于古今异言,才需要训诂。孔颖达又进一步把诂、训、传都作为注解的别名,后人称训诂学为注释学,把注释、传疏都称训诂,其源盖出于此。清代有关训诂的解说也大致如是,清代段玉裁、马瑞辰等学者从散言、对言、连言的角度分析,得出“故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的结论。

黄侃综合诸家之说,提出自己的定义。所谓“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指训诂对象主要是本来的语言也就是古代语言;“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指训诂内容,主要是解释语言中词的引申、假借等语言变化;“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指训诂本质是一种语言解释活动,这种解释活动,或“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从时空两个维度界定训诂活动的

开展方向。换言之,训诂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时间和空间相隔,造成了语言上的障碍,正如戴震所言:“土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疑,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传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17]可见,黄侃的这个定义从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高度,说明了训诂的对象、内容和本质,这就比前人对训诂的解释更科学、更全面、更抽象^[18],已经具有了现代解释学的意味了。

其二,“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往的旧训诂学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善于从语言这个大系统中去“论其法式,明其义例”。黄侃的“真正之训诂学”,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以语言解释语言”,要不受“时地的限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去观察语言的发生、发展、变化,从中“论其法式,明其义例”。因此,他说:“训诂非但施之于古书,亦施之于今文,非但施于纸上,而且施于语言。”^{[12]139-140}将训诂的内容推广到非常广泛的地步,实乃发前人之所未发。又说:“小学之于群籍,由经史以至词曲,皆不能离之,而或以治小学仅为读周秦两汉之书,误矣。”^{[13]10}黄侃的确充分践行了他所言之训诂。他“不仅熟读经史,研治《尔雅》《说文》诸书,从中归纳训诂法式和义例,而且下及唐宋诗文词曲、家乡当代方言,作了大量笺识,说明字之正、讹、通、假,寻本字,系语源,定讹脱,补前人之所未备,述治学之心得,文笔所至,莫不精妙”^{[18]123}。如果说“论其法式,明其义例”是新训诂学最基本的任务,那么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则是新训诂学最根本的目的。对“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的追求是黄侃终身努力的目标,黄侃曾如是曰:“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偏识,义不能偏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凡治小学,必具常识;欲有常识,必经专门之研究始可得之。故由专门而得之常识,其识也精;由浏览而得之常识,其识也迷。盖专门之小学,持之若网在纲,挥之若臂使指;而浏览之学,则雾中之花,始终模糊耳。”^{[13]2}指出有系统条理方能谓之学,强调小学作为学者的必备之技能,掌握运用好这一技能,学者之学才是名副其实的“学”。

总体来看,黄侃“用语言解释语言”来定义的训诂,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训诂了,它不仅具有现代解释学的意涵,而且具有训诂哲学的意味了。所谓“训诂哲学”,包括文字学意义上的训诂,只是更侧重文字的哲学意义,同时,也比一般所说的“哲学解释学”范围也要宽泛一些^{[19]17}。黄侃这样的“论其法式,明其义例”的训诂精神,体现了“不是把训诂当作哲学,而是把训诂当作哲学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重视经典的搜集整理和语言变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把哲学看成是训诂的一种升华,寻求文字之‘上’的普遍意义”^{[19]17}的训诂哲学之精神。这样的训诂哲学,可以说是传统的训诂学、经学与现代的诠释学相对接的一个有效途径。

四、黄侃语言哲学的历史定位

黄侃在汉字的起源、构造、孳乳、变易以及文字声义关系等方面多所发明。《论六书起源及次第》《论六书条例》为中国一切字所同循,不仅施于说文等文,阐明“六书”的起源、次第以及与字体的关系;《论变易、孳乳二大例》揭示了汉字“变易”“孳乳”两大发展规律。此外,关于汉字的笔势、字书等,黄侃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20]。

总体来看,黄侃勾勒的是以形音义为一体,以声音为核心,以“六书”为“造字之本”,以“变易”“孳乳”贯穿文字之变这样一个语言哲学体系。质言之,这是语音中心主义的语言哲学,而这一点可以在黄侃为《新方言》所作后序中找到清晰答案:“方今中国虽衰,学术未泯,宜有好古审音之士,绍隆斯绩。倘令殊语皆明,声气无阂;乡曲相鄙之见,由之以息;文言一致之真,庶几可睹。”^[21]此处,黄侃看到了好古审音对于中国学术的重要性。随后又在《论斯学大意》作了进一步阐发:“小学分形、音、义三部。……三者之中,又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凡声之起,非以表情感,即以写物音,由是而义傅焉。声、义具而造形以表之,然后文字萌生。昔结绳之世,无字

而有声与义;书契之兴,依声义而构字形。……小学徒识字形,不足以究言语文字之根本,明已。”^{[11]257}声音无非两类,或表情感之音或拟物形、肖物声之音^{[22]258}。他指出:“治音学者,当知声同而义各殊之理。”^{[22]260}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声训释训的意义和价值不在其有效性而在其合理性上,即同音字在看似随机选择的背后,有其意义生成的存在论基础,是一种基于生存理解的价值选择关系^{[14]288}。

因此之故,黄侃所追求的求本字和寻语根的文字研究方法以及“以语言解释语言”的新训诂学,是其在现代语言哲学史中所作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国现代语言文字之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黄侃与其师章太炎一道开创了薪尽火传的章黄学派,为现代语言文字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其语音中心主义的语言哲学往往遭致“声音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是随意的”之类的批评。如:王力认为,中国古代的声训是“从心所欲地随便抓一个同音字(或音近的字)来解释”^[23],并对其中的极端情况进行了批评。又如尚杰批评的那样,“音韵学的要害,在于确定了语音与语义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语音本身也具有任意性,它与索绪尔所谓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相似的”^{[24]68},并指出,“汉字基本上属于字形和字音‘分裂’的语言”^{[24]72},导致“我们被同时为‘近’的音和形两个因素吸引,一会儿在‘音’的因素上走向极端,一会儿在‘形’的因素上走向极端”^{[24]72},黄侃属于前者,而许慎则属于后者。从语言学来看,尚杰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广义的声训中的确有很大一部分材料是不符合语言规律的,但因此彻底否定声训的价值也是不可取的。众所周知,语言中是存在着音近义通的规律的,约定俗成是音义关系的总规律,音近义通则是词汇发展所造成的局部规律,二者各有其合理性。黄侃声训理论的语言哲学意义不仅在实际上联系了一部分同源词,成为了近代科学词源学的开端,而且在理论上促使了人们考虑音义之间的联系,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建初. 黄侃先生所批“《说文》同文”初探[J]. 古汉语研究, 1990(2): 55-63.
- [2] 李运富. 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J]. 古汉语研究, 2004(2): 39-45.
- [3] 黄千驹. 论黄侃先生《说文》学研究的成就[J].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4(4): 63-67.
- [4] 周建设. 先秦语言哲学思想探索[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7): 145-146.
- [5] 许国璋. 论语言和语言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15.
- [6] 黄侃. 论文字初起之时代[M]//黄侃, 刘师培.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黄侃·刘师培卷. 吴方, 编校.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215-216.
- [7] 姚小平. 西方语言学史: 从苏格拉底到乔姆斯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241.
- [8] 黄侃. 论六书起原及次第[M]//黄侃, 刘师培.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黄侃·刘师培卷. 吴方, 编校.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218.
- [9] 萨丕尔. 语言论: 言语研究导论[M]. 陆卓元, 译. 陆志伟, 校订.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6.
- [10] 林远泽. 身体姿态与语言表达[J]. 欧美研究, 2015(6): 196-197.
- [11] 黄侃. 论斯学大意[M]//黄侃, 刘师培.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黄侃·刘师培卷. 吴方, 编校.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12] 殷孟伦. 黄侃先生在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M]//张晖. 量守庐学记续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13] 黄侃.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 黄焯, 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4] 李志春. “由音见义”: 声训中的意义生成机制及其形上之维[J]. 思想与文化, 2023(1): 236-257.
- [15] 黄侃. 黄侃论学杂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360.
- [16] 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 卷一. 阮元, 校刻. 清嘉庆刊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61.

- [17] 戴震. 戴震全书:卷六[M]. 张岱年, 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 1995:275.
- [18] 黄孝德. 黄侃小学述评[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121.
- [19] 张丰乾. 训诂哲学:古典思想的辞理互证[M]. 成都:巴蜀书社, 2019.
- [20] 黄德宽, 陈秉新. 汉语文字学史[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311.
- [21] 黄侃. 新方言后序二[M]//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新方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150-151.
- [22] 黄侃. 论字音之起原[M]//黄侃, 刘师培.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 吴方, 编校.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23] 王力.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1:36-44.
- [24] 尚杰. 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The Contrib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Huang Kan's Linguistic Philosophy

SONG Yu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China)

Abstract: Huang Kan's contribution to the linguistic philosophy lies in three aspects: the origin of languag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 hermeneutics. First, he asserted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taken form in the antiquity, challenging the myths about their origin. Second,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he traced the origin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pictographic, indicative characters. Third, he defined the research subject, content and nature of hermeneutics from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levels, by using language to explain language, in quest of the system and origin of language. These are h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linguistic philosophy, greatly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philology.

Key words: Huang Kan; linguistic philosophy;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the original pronunciation; using language to explain language

〔责任编辑:何敏敏〕